

美国这个谜

刘宾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序.....	刘宾雁	
美国这个谜.....		1
初探美利坚.....		14
五十年间争雌雄.....		32
美国：广阔而狭小.....		60
在成功者的身影里.....		67
科学开拓生活.....		87
远方的注视.....		91
尽管钟声回荡.....		98
法国走它自己的路.....		104
他们不肯遗忘.....		110
附：		
刘宾雁，我的朋友.....	聂华苓	138

序

刘 宾 雁

在我这一代人中间，我是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较早地发生了兴趣的一个人。回想起来，这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父亲十几岁时去了俄国，二十几岁归来，说一口漂亮的俄语，但又常常给我讲他在俄国的经历——从沙皇时代到十月革命以后。他对俄罗斯人和俄国共产党的感情深深地感染了我。这样，大约从十二岁时起，我对于苏联、俄国文学与俄语就先后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偏巧这又是芦沟桥事变发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逐渐成熟的时期。于是我的眼光又向日本和整个欧洲伸展开来。

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从童年起就使我的

自尊心常常受到损伤，又使我把中国的社会问题同国际上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苦苦思索。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各种疑问。我要向世界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我对于外语的兴趣就猛烈增长起来。经济条件不允许我继续受正规教育，我自学的毅力便越是坚强起来，并且在别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外语学习中获得了很大乐趣。

哈尔滨这个国际城市的特殊环境，也促进了我对于世界的兴趣。道里区虽然已不再是俄国人的租界，但大都居民仍然是俄国人，犹太人，还有来自欧洲十几个国家的侨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东方人，因而，越过划分“道里”与“道外”区的界线——一条铁路，便仿佛进入一个异国。那里，最使我向往的是一些俄国人办的私人图书馆和旧书店。从我还完全看不懂俄文书的时候起，那些纸色发黄、经过重新装订的旧书所散发出的一种特殊的书香（其实多半是霉味），对我就有了神秘的魅力。沉睡在那些藏书室中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好象等候着我去同他们对话。

同时，一本又一本日文的杂志，向我诉说着欧洲日益严峻的局势。四十年代初，日本已经纯然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了，但在日本占领

已近十年的哈尔滨，仍然可以合法地买到日文的马克思著作，可以读到从日本的敌国传出的（自然是经过选择的）政治信息。他们似乎并不那么害怕这些东西会毒化日本人的思想，也许是因为他们需要比较成熟的臣民为天皇更好地效劳吧。

这个时期，我读过俄国的贵族、法国的纳粹分子和日本并非进步的作家所写的很多东西。然而它们并未能阻止我的思想向中国共产党靠近。奇怪的是：俄国贵族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反倒促使过包括我在内的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走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

1949年7月，我有幸第一次踏入向往已久的苏联。我先后去过四次苏联，去过匈牙利和波兰，还去过瑞士，但几乎甚么东西都没有写。不过这并不是说我没有收获。

1954年春随新闻界前辈邓拓同志率领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访美，已经感觉到斯大林死后苏联开始发生的变化。那些年，从中国人可以随意订阅的苏联报刊里，我一直追踪着这种变化。同年秋与苏联作家瓦连钦·奥维奇金的相识，使我对于由他开创的苏联文学界新潮流（“干预生活，反对粉饰生活，写生活的阴暗面”）有

了更多的了解。我能得风气之先，是促使我在1956年初和同年夏季写出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的重要原因。后一篇特写，则更多地借助于1956年春访问波兰时从那里新闻界在苏共20大以后发生的巨变中受到的鼓舞。

但是同八十年代相比，五十年代我的国外之行之所以没有留下什么文字，仍然有一些很值得注意的原因。1957年以前，我也象几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于中国当时的状态感到满足，因而不觉得有必要从国外现实中寻找什么启示。同时，一套长年形成的固有的意识形态，又使我对于许多本来可以从中得到启迪的现象抱有先入为主的想法，因而对于应予怀疑的东西未曾怀疑、甚至特意寻找理由为它们的存在给以辩护。然而毕竟没有什东么西使我激动到必须拿起笔来讴歌赞美的程度。

1956年去华沙和往返途经苏联的时候，我倒确曾有过写作的冲动。去时，正值克里姆林宫里在召开苏共第20次党代表大会。我那时自然不可能知道赫鲁晓夫在作那个著名的“秘密报告”，但根据我对于三年来苏联社会演变状况的了解，当我在莫斯科街头徜徉时，却颇有春风拂面、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的感觉。偏

巧还是冬末春初，从街头少女的身姿和衣着的变化上，我猜想苏联人终于比过去生活得更轻松更自由了。波兰的变化则更为显著。华沙新闻记者俱乐部中人们的兴奋和心头的骚动，同一年以后反右派运动的前夕十分相似。那时我真的认真想过要写一篇报道。文章虽未写成，但归国后我却用讲演的形势把这些信息传播到从松花江畔到鄂西山城恩施的许多地方。

收在这本文集中的文章，则写于二十余年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从1956年春我的欧洲之行到1982年秋赴美访问的二十六个春秋里，我本人和我们的祖国都经历了难以言状的复杂。

1979年初我和几十万同命运者恢复做一个中国人的权利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吹起一次什么风，而象我这样以为报纸写稿为生的人能够在我所属的那家压严的报纸上来发表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而生活中可写，读者渴望读到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简直取之不竭。到1982年我去美国时，便顿生一念：为什么不可以写一写美国呢？我需要向中国读者诉说的话，也许透过我写美国的文章来说会更方便一些。

由于聂华苓和保尔·安格尔的好意安排，我和朱洪在美国的停留时间可以延长到四个半

月。但是这对于写一本关于美国的书来说还是过短了。语言又是一个障碍——我的英语仍然是聋哑英语，即只能读书看报，而抓紧时间从报刊上搜索材料的结果，又使我更少时间去和美国人直接来往，从而使我的英语长进很慢。

归国以后，便有铺天盖地的事情向我袭来。加以正如新华社一位长驻国外的同志的经验之谈：“你对一个国家了解得越多，就越是不敢下笔”，我终于未能完成计划中的这本书。

对于一个同世界隔绝了几十年、居民中有条件出国的人寥寥无几的国家来说，每一个有写作能力的人都有责任把国外的情况尽量真实、尽量多地介绍给国人。语言条件已经给我们以难以克服的限制（西德的中学毕业生都懂两种外语，而我们即使是作家和记者中懂一种外语的人也不及十分之一），如果再由于其他并非不可克服的原因而自我封锁，回避真实，就太可悲了。

法国和联邦德国我已经去了两次，现在正从事对美国的第二次访问。值得告诉国内同胞的事情真是不少。由于活动的安排很紧，常常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有，而时过境迁，许多事实和印象就从记忆中消失了。我想，也许需要寻找一种形式，才能把更多有意义的东西传达

给国内的读者。

曾经有几十年时间，以为无知是培养“革命觉悟”的最良好土壤。六十年代初期，中国曾经历过一场大多数中国人既不了解其原因、也不知道其规模与后果的大饥荒。那时，戴着右派帽子的我，曾在“中国青年报”国际部的资料室做剪贴资料的工作。偶尔也从外国报刊上翻译一点东西。我们每天展示给中国人的西方世界，无非是犯罪，失业和道德败坏。这种报道既未能阻止当时那里正在兴起的一场规模浩大的科技革命，也未能预防二十年后中国青年的“世界大串连”浪潮，失业、犯罪和道德败坏，今天也是有的，而且看来很可能还是那个世界的不治之症，然而正如当时关于国内的报道永远是“形势大好，从来也没有这样好”一样，这种国际报道也并不能使中国人对于他人和自己有一个真实的了解，其结果不是消灭了那个我们日夜诅咒的世界，倒是把中国人在无知与狂热中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一切出于眼前功利需要的考虑而对真实信息进行的封锁或歪曲，都不可能持久，并且只能带来相反的效果。如果我们不是几十年如一日地把另一个世界指画成恶魔，也许今天就不

会有那么多人把它看成天使了。更要命的，是他们会有一种声音丧失信任，结果便会使“狼来了！”那个故事成为现实。

1988年9月4日

于哈佛大学

美国这个谜

当波音747在旧金山上空徐徐下降时，我特地从机窗里向后张望一下，见有两架客机尾随在后，也在降落。下机后，我们走进宽敞明亮的候机室。我粗粗数了一下，通往各条航线班机的进出口竟然有大约九十几个。

三架国际航线的飞机同时在一个机场降落，一个国际机场就有九十几条孔道通向世界，这就是我对美国的第一个印象。

候机室里每隔不远就有一台或几台公用电话。美国人除极少数例外，家家都有电话机。全国平均不到两人就有一台电话机。每台电话机都可以直拨美国五十一个州任何地方的电话；除几个国家和地区外，还可以直接拨通世界各地的电话。接通迅速，声音清晰，收费不高。美国人已经常常以通话代替通信了。

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方便，给美国人提供了更多了解世界和开展国际交往的机会。然而，美国人是不是真正准确地了解世界呢？美国人之间的关系是否更加亲密了呢？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以后逗留美国的几个月中，我多次遇到

这类问题。我几乎时时处处都可以碰到美国物质、技术条件优于中国的事实。然而，我同时发现，这些优越条件带来的效果，却同人类的理想不尽一致。

有一垛无形的墙

同美国人交往，语言并不是唯一的障碍。洛杉矶中美作家会议开会的前夕，我们和美国作家在主人诺曼·卡曾斯家的庭院里会面。作家、《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哈里斯·索尔兹伯里会讲俄语，六十年代红极一时的诗人斯奈德曾在日本居住十年，娶了个日本妻子，自己会讲日语。这样，当我的蹩脚英语失灵的时候，我还可以说几句很生疏的他种语言应付一时。尽管如此，仍不时觉得相互间的交流很不顺畅。

开会的几天，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坐在我的左边，我的右侧是法国血统的女作家费兰辛·格雷。他们的态度都是很友好的。格雷在一次晚餐席上甚至毫不隐讳地告诉我，她可能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女儿。显然，我们本来可以谈得更多和更深些，但无形中好象有一垛墙横在我们中间。后来逐渐明白了，原来妨碍我们加

深相互了解的，就是我们对对方的过去了解太少。我读过阿瑟·米勒的几个剧本，那还是五十年代的俄译本，但对他本人的经历则几乎一无所知。对于格蕾，则连她的作品也没有读过。加以对美国近几十年的变化所知甚微，我就很难找到适当的话题了。他们对我们，也是一样。这种状况，同现代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显然是很不相称的。

几个月以后，我才知道应该向他们提一些问题，却已经时过境迁了。其实，我本该听听当年红极一时的两位诗人金斯伯格和斯奈德谈谈他们对六十年代末期美国校园里发生的“反叛”的体验，和他们对十几年来美国进步运动何以发生如此大的起伏的看法。而阿瑟·米勒若是向我谈谈他在50年代初的那场麦卡锡反共高潮中受到迫害和勇敢应战的情况，也会对加深我对美国的了解有所裨益。

然而，在其后和美国人接触中，仍然时常发生答非所问，隔靴搔痒的情况，于是只好草草收场，握手告别。责任并不在翻译，而是由于双方都对对方知之不多，互相摸不着头脑，既不知如何提问，也不知需要谈些什么。

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会对很多事感到新鲜有趣。欧洲人就没有这个福份。中国人也会对

一些事看不惯、想不通、抱反感。而在这方面，欧洲人却占了便宜，他们不必费这根神经。在这个地球上，中国不说是独一无二，也是和美国最少近似之处的国家之一了。他们多的，我们少了，我们有的，他们缺乏；美国人司空见惯的，在中国会是大逆不道；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美国人会感到惊奇不解……在好些事上，这两个国家都处在两个极端上。也许正因为这样，在我启程赴美前夕，一位友人才会说：“了解美国，会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国。”

然而，这种了解，可并不那么容易。

曲径通幽

了解一个国家，象了解一个人一样，你若图省事的话，可以“一言以蔽之”，于是它或他就会以单一、纯粹的面目储存到你的记忆中。但是，如果你不满足于简单的分类归档，不甘于把生动奇特的现象纳入熟知的概念，那么就会有一个又一个的现象向你扑来，挑起你的好奇和疑问。于是，你就会落入一个思绪翻滚的无底洞中。

衣阿华市以大学生为主要住客的“五月花”

公寓楼下，每天清晨，长椅上会出现两大摞新出版的报纸，免费赠阅。那是衣阿华大学“学生政府”办的日报：八大版，广告很少。“学生政府”之外还有学生的“议会”，性质和权力当然同真正的政府和议会不能相比。但“学生政府”却有一张学生自己办的报纸，这还是可爱的。我可以从那上面多少感知一点衣阿华大学这个小小的社会里发生些什么，学生们在想些什么。

紧挨着报纸，放着两捆彩色印刷的形状近似报纸的广告。几百种商品和衣阿华的所有商店在向你招手，大字印明商品减价出售的不同的折扣。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落入广告的包围中。你早晨从一条缝儿向信箱里窥视，哦，有信了，于是赶忙按既定号码扭开铁门，结果大失所望：原来是寄来的广告！电视里，广告不断打断任何你正在观看的节目。报纸上，整版整版的广告。走到街上，打短工的青年向你手里塞的也是广告。你感到心烦，你觉得用那么多上好的纸张（有些简直是很好的封面纸）印这些玩意儿，实在是罪孽。可是，不久你便会知道，离开广告，这个社会的运转就不堪设想；广告的意义和作用并不仅仅是让仓库里或货架上的东西销售出去。在每一种新

产品后面，都有一个或一群人为了生存，为了战胜同行并获取最高的利润而费尽心机投合或诱发顾客的需要，独出心裁创造或改善一种商品；另¹⁶一边，则是一群人想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更多的舒适和满足、各种已经体验或尚未体验过的乐趣，方式越新奇越好。除了广告，还有什么办法能够使双方经常沟通呢？但是，你心中也许不免还会产生一个疑问：究竟是做广告的人在迎合顾客的需要呢，还是顾客在广告的刺激和诱惑下不断萌发着更多的欲望和需要？

事情总是比表面看到的要复杂一些，甚至复杂得多。以我们的传统造成的我们的观念去套另一个社会的现象，黑白分明，非此即彼，但有时兴许会上当。比如吸毒，当然是坏事；但如果就此推断一切吸毒者皆是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分子，那么，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最早的吸毒者却是六十年代反叛美国统治阶级的大学生了。今年，滚石音乐又时兴起来了。中国人一听就刺耳，会说这是“黄色音乐”。岂不知它也是六十年代末期进步运动的产物，只不过这种音乐连同它的歌手后来都被资本家收买过去，使他们大发横财就是了。这又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特点。

在美国，好象故意同惯于以固定概念去套